

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

抗战记忆

编者按：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；八年抗战，可歌可泣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即日起《石景山报》将陆续刊登我区尚健在的40名老战士的抗战记忆，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硝烟弥漫的战斗生活。他们浓厚的爱国情怀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战斗意志，激励着我们后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，珍爱生命、开创未来。

王木铎：潜伏在宛平日寇身边

潜伏炭矿电话所 情报发往游击区

日伪统治时期，我的父亲王金山经常利用到北平卖干鲜果品和木炭的机会，为八路军游击队购买发报机用的电池、印刷用的铅字以及药品、食盐等紧俏物资。我母亲生了六男两女，我排行老大，由于旧社会生活艰难，3个弟弟先后病死。小妹是1936年冬天出生的，1937年夏天日本鬼子搜山时，母亲带着小妹和乡亲们一起藏进了山洞，小妹在黑黑的山洞里啼哭，为了让山洞里的30多人不被杀害，母亲和婶母二人用手捂住小妹的鼻子，鬼子走了以后，小妹已经窒息而死。国仇家恨对我后来坚定地走上抗日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1942年11月，我父亲托关系，在日本煤炭株式会社大台炭矿电话所为我找了一个电话交换手（类似现在的话务员）的工作。不久，经我党地下工作者穆怀春介绍，我加入了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（后改为第11军分区）宛平情报站从事情报侦察工作，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员，化名孔英，代号02。我的具体任务是：利用接电话的有利条件，窃听敌特机关的通话，收集日伪军在平西地区部署、调动等军事行动的情况，并把敌情动态及时送到情报站。

我搜集到的情报通过两个渠道

发出去：一个渠道是通过地下交通员、宅舍台村玉皇庙老道张明学。每天上午8点至9点，他利用从游击区往大台火车站运送木炭的机会，在我们事先约定的地点，把上级给我的信压在一块不显眼的石头底下，同时把我写的情报取走；另一个渠道是我通过电话把情报告诉有关同志，再由他们设法将情报送到宛平情报站。

那时候，日伪军每次去平西地区扫荡之前，门头沟的敌人都会事先给大台日军守备队、大台警察分驻所、落坡岭警察第九分所打电话，命令他们在大台、西桃园、东桃园、清水涧等村抓民夫，为在大台站下火车的日伪军搬进山扫荡用的弹药和物资。由于及时获取了情报，敌人从门头沟出发之前，我便向驻门头沟办事处询问开往大台的火车增加了几节车厢，以此来推断参加行动的日伪军的大概人数。从1942年11月至1944年8月，敌人每次进平西山区扫荡时，我都能提前两个半小时送出情报。

游击区得到我发出的情报后，老百姓迅速坚壁清野进行转移，民兵在路上埋设地雷，上山等着打伏击，军分区调动部队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待歼消灭敌人。因为情报准确可靠，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掌

握，所以日伪军几次进山扫荡都扑了空不说，还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。

机智勇敢巧周旋 家人几渡“鬼门关”

做情报工作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；必须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，随机应变。194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大概3点多钟，我正在家中北屋写情报，大台日本守备队一个叫三甫的特务突然闯进屋里。由于我事先有准备，在三甫掀门帘时，我迅速假装正在练习写日文。趁聊天间隙去厨房给他烧开水的机会，我烧掉了写有情报的纸条，整个过程三甫都没有发现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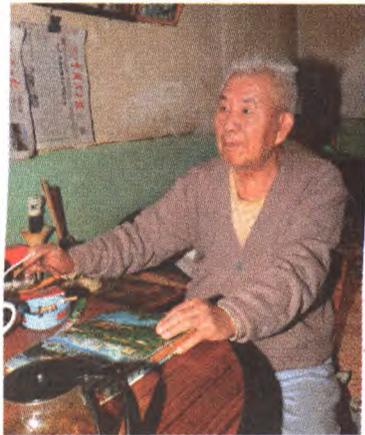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我还与人合作绘制了一张大台地区日伪军兵力部署图。我们在这张图上详细地标注了各据点日伪军人数、日伪军头目姓名、武器装备、炮楼结构、围墙高度和宽度、电网开关位置等重要情报。这张兵力部署图在1942年12月、1944年8月和1945年5月，我军三次攻打大台日伪军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张图现在保存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馆里。

1944年8月，父亲为了保释被大台日本守备队抓去的几名同志，被日军逮捕拘留，严刑拷打。在被押往门头沟日本宪兵队的途中，他因伤势太重未能逃脱，押到宪兵队

后又关了两个多月，受尽了各种折磨，敌人多次对他施以酷刑，他始终没有向敌人泄露任何机密，保护了宛平情报组织的安全。也正是因为忙于营救父亲，我辞掉了大台炭矿电话交换手的工作。

此后，我利用协助父亲从大台地区收购木炭运往北平出售的机会，继续为我党做地下工作：一是侦察西直门至大台地区驻扎日伪军的情况，继续向宛平情报站报告；二是绘制落坡岭日军兵营、警察第九分所和色树坟警备段炮楼的地形图；三是配合、掩护孙炳兆同志在大台、北平等地与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接头联络；四是协助我父亲从北平为后方根据地采购物资。

就在抗战胜利前夕，我和家人还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。一次，我方区长石良璞到我们村白永堂家开会，三甫躲过了放哨的村民，突然闯进白家。石良璞从身上掏出了手枪，吓跑了三甫。等三甫带着日本兵来围捕我们的时候，来开会的人早就跑光了。没有抓到，三甫又带着一帮鬼子和伪军，气急败坏地到我家抓我和父亲，结果也扑了空。可恶的日本鬼子竟然把我爱人安淑琴和我姐姐王木芝抓走，逼她们说出我和父亲的下落，她们俩始终没有说。当天夜里，她们被



王木铎，1929年7月出生，河北宛平县人，1943年10月参加革命，195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加入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宛平情报站，为我军搜集日伪军情报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宛平县第五区财政干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由宛平县公安局派遣到门头沟做地下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在石景山区建设局、石景山区环卫中心等单位工作，1987年12月离休。

关在了大台警察分驻所。又过了一天，我军分区派出部队，里应外合攻下警察分驻所和鬼子的炮楼，才把她们救了出来。

3个月之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。 采写：梁海冰

安茂林：生死穿越封锁线



安茂林，1930年9月出生于河北定县（现定州市）来合庄村，1944年10月参加革命，1948年5月入党，先后多次立功受奖。1958年5月转业到石景山区工作，1990年10月从八角街道书记岗位上离休。

我们那个村五六十户人家，都是地道的老百姓，姓安的只有我们一户，我家在村里算是最穷的。12岁那年入夏不久，日本鬼子纠集石家庄、保定、安平等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500多人，分路包抄了定南县委、县大队、后方机关所在地北疃村。这个村及邻村抗日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抗击，但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入地道。在汉奸的指引下，鬼子发现了地道口，将具窒息、催

泪、喷嚏性毒气弹投进地道里。残忍的鬼子在洞口点燃柴草，盖上棉被，毒气与浓烟致使数百名村民窒息身亡。鬼子抓获抗日军民80余人，由于毒气发作，一夜死去十多人。冀中军分区加强了对日军的监视和反击，一有机会就给予致命的打击，鬼子终于“收敛”了不少，但加强了重点部位的封锁和检查。

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加入了抗日武装的行列，剩下的一些稍有体力的人，被鬼子强押过去挖壕沟、修阵地，连我这样的十来岁孩子也不放过，让我去搬砖头。我又饿又累又恨，一边流泪一边暗暗发誓，快点长大吧，长大了打鬼子去。

大约又过了两年多，华北形势发生了变化，抗日武装在完县、涞源、易县等地已经站稳了根。鬼子兵在交通要道加强了兵力，布置了多道严密的封锁线。入冬不久，敌后武装悄悄到我们村拉队伍，父亲考虑再三，最终同意了让我去打鬼子。我那时14岁，村长告诉我报名时就说16岁，太小了不让我去。

在我们那一带负责征兵的是孙队长，听说打过不少仗，与日本鬼子面对面交过手，还立过大功。跟

我一起报名的有11个人，我年龄最小。部署的第一个任务是设法穿过鬼子在清风店设置的哨卡。日本鬼子在主要路口架起了机枪，拉起了铁丝网，对过往行人盘查得很严。我瞅着孙队长的盒子枪心里直痒痒，心想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枪就好了。孙队长对我说过了封锁线，到解放区就不愁有自己的枪了。还说，他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，离这儿不远，万一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请我有机会去看望下，我当时没多想就点头答应了。

孙队长带我们一起去清风店，半个时辰走十几里路，我们在离关卡老远的地方住下观察敌情，这一个月吃住全是靠孙队长张罗，他一有时间都给我们讲战斗故事，还教我们摔跤，教我们如何侦察。第二次再去探看清风店敌情，发现与上次情况差不多，孙队长再三思量，还是决定原路返回。又过了十来天，我们才听到往北二十多里外的望都后天有集市，孙队长决定转到望都找机会通过敌人封锁。

这一次孙队长改变了方法，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三个小组，让我自己单独一个组打头，他带5人一

组断后，其他6人在中间。望都的集市很有规模，我趁着人多混进了人群，可能是我看起来确实过于憨傻，没引起鬼子和汉奸的注意，我顺利通过了敌人关卡，第二组也平稳地通过了。就在我们暗自庆幸的时候，出事了。一个汉奸发现了孙队长的身份，大喊“八路！”孙队长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耳光，把汉奸给打晕了。这时，一边的几个鬼子飞快窜过来，端起枪对着孙队长就是一梭子，孙队长枪还没拔出来就倒在了血泊中。当时我离孙队长最多也就几十米远，亲眼看到孙队长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下，敌人是多么的可怕！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。

悲痛之中，我没有忘记孙队长说的话，拼了命一样使劲朝西北方向跑，第二组也有两三个人跟着我跑。出了县城后，我顺着白菜地沟爬了一二百米都不敢抬头，不时地有子弹从头上飞过，没有动静了我才爬起来继续往西北方向跑。谁知道走了没几里路，突然又被几个持枪的人围住了，问我干什么的，要去什么地方，我装聋作哑一声不吭。其中一个人问我是不是和孙

队长一起从定县出来的，对方一提孙队长，我立马泪如泉涌，就一五一十地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，那人说欢迎你小同志。我这才知道到了八路军的地盘，我已经跑了十几里地。

我被分配到了教导队；在队部当通信员。这是我到部队的第一个岗位，发送文件、通知，传递口令，每件事都干得很欢实。这期间，听说与我同行的人中被鬼子抓起来7个，因为没有证据又把人家放了，他们几经辗转才找到教导队，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。

没过几天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，赶赴张家口接管苏联红军留下的地盘。我们教导队约1000人经唐县、涞源、蔚县、下花园到了张家口，整个教导队改编为补训团。我被分配到军械处当了一名军械员，天天接触枪械，经常想起孙队长的样子。

3年之后我提了干部，当了排长，跟随部队参加了清风店战役。在战后休整期间，打听到孙队长的母亲刚刚过世不久，我非常遗憾没能替孙队长看望一下临终前的老母亲。

采写：黄河